

济体系和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巩固的基础。三年的具体奋斗目标是：一、提前五年实现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十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二、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三、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科学规划纲要。上述三年任务目标依然过高。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精神没有得到体现。但是，由于当时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各项矛盾逐步显露出来，对每一年度计划安排和综合平衡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五年规划中后三年计划安排；后三年计划指标的确定已没有多大经济发展上的指导意义。在决定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后，年度计划是每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依据。

到 1962 年底，由于认真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转机。但是，从二五计划时期国民经济发展与八大《建议》提出的计划指标相比，国民经济发展明显受到了很大损失，除原油、原煤和发电量达到计划指标外，钢、水泥、棉花、粮食都没有达到计划指标要求，有的甚至低于 1957 年或 1952 年的水平。这主要从以下几项措施中反映出来：一、国民经济整体实力遭到极大削弱；1962 年国民收入仅有 92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低于 1957 年的 14.4%，与八大《建议》提出的五年期间国民收入增长 50% 的计划指标相去甚远。二、农产品严重不足，特别是粮食不足，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首要问题。1962 年粮食总产量 3200 亿斤，比 1957 年减少 18%，只相当 1952 年产量的 97.6%；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 480 斤，只相当 1950 年的 479 斤的水平；三、经济效益极为低下。从投入产出比来看，二五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增加 87.7%，而工业产值 1962 年仅比 1957 年增长 19.9%，国民收入甚至大幅度下降。投入大量资金只得到国民经济如此低下的产出，甚至无产出，经济建设中的浪费是骇人听闻的。四、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1962 年与 1957 年相比，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水平低 19%，猪肉消费水平低 57%，棉布消费水平低 47%。1962 年底居民结余购买力高达 127 亿元，由于商品匮乏而无法实

现。1962 年的经济状况与 1957 年时国民经济蒸蒸日上的状况简直无法相比，这正是对二五计划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最好的客观评价。

国民经济发展出现大起大落，主要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的错误，但与二五计划编制中的脱离实际问题不无关系。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意见书》之所以严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脱离经济发展实际，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受到“左”倾指导思想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落后，迅速发展生产力，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化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要求。不可否认，二五计划《意见书》反映了全国人民冲破旧的生产关系束缚尽快改变经济落后的愿望。但是，这决非短期内可以实现。忽视经济落后对经济发展的极大制约，违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必然导致经济计划安排丢弃实事求是的方针和综合平衡的原则。其次，历史地看，各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存在着内在联系，二五计划编制受到一五时期经济发展连续性的影响。一五时期，重工业发展过于突出，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够，这为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中重工业孤军突出的矛盾潜伏下了不合理因素。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地完成，也造成二五时期经济发展过多强调生产关系变革，甚至提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等等。这些是二五计划《意见书》走向失误的重要缘由。

二五计划编制工作经历了比较客观到脱离实际的过程，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与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意见书》形成明显对比。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建设事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

— 49 —

— 50 —

No. 4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裴棣 韩钢

1958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这是改常任制后召集的第二次会议，也是史上唯一的一次这种类型的会议。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这次党的代表大会产生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人民日报》曾这样来概括它的意义：“这次大会是整风的大会，是大跃进的大会，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正在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①

23 年后，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对它作出评价：“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

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人们都承认这次大会在“大跃进”运动发动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于“大跃进”运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是一次全党动员的大会。

大会的召开

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是在 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讨论的。3 月 31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这个通知确定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时间、议程、列席代表分配名额，同时确定了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前召开党的八届四中全会。

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之后，1958 年春天已经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跃进”势头。4 月份，国家统计局提供了当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说：第一季度全部工业总产值（包括非独立核算的企业，不包括手工业）完成全年计划的 25% 以上；而以往年份一般在 23% 上下。中央企业总产值完成季度计划的 106.4%，与上年同期比较，增长 26.6%；其中一机部增长 63.8%，化工部、冶金部、煤炭部增长 30% 以上。地方企业总产值完成

^① 《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1958 年 5 月 29 日《人民日报》社论。

— 51 —

— 52 —

季度计划的 104.3%，比上年同期增长 19.1%，其中云南增长 72%，福建增长 53.8%，安徽增长 53.5%，河北增长 40.3%，青海、内蒙古、甘肃都增长 30% 以上。基本建设投资额完成的绝对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51%；3 月份完成的投资额超过 1、2 月份之和。固定资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约 35%。^①不久以后，李富春副总理在八大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根据国家计划的第二本帐，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比去年增长 34%，但 4 月份的实际已比上年同期增加 42%；截止 4 月底，增加的灌溉面积已达 3.5 亿亩，超过全年计划 0.6 亿亩；增加的造林面积，已达到 2.9 亿亩，超过全年计划 1.4 亿亩。

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反保守、批右倾、高指标、高速度的形势，给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造成一种热烘烘的气氛。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酝酿和形成的一系列脱离国情、背弃规律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为八大二次会议提供了思想基础。所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几次讲到：我们这个会有南宁、成都会议的准备，有去年冬天、今年春天水利积肥大跃进的事实，这个会就好开。毛泽东还说：水利、积肥、大跃进，工业大、中、小同时并举，什么都并举，什么都出来了，都明朗了，这个会就好开了。所以年年要讲团结，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你这样想，他那样想，每人想法不同，水平不同，不开会大家想法不同，开个会采取比较合理的意见，作个报告，搞个决议，全国人民就有了方向。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主要目的，仍是统一全党的思想，明确全国人民的努力方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掀起“大跃进”运动新高潮。

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前，5 月 3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党的八届四中全会。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出席外，不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全会讨论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议程、各代表团的组成和大会主席

① 《今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1958 年 4 月 15 日《今日新闻》。

团的组成，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报告。

5 月 5 日上午，八大二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会上，通过了大会的日程和主席团成员名单，并组成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中直、军队 8 个代表团。大会主席团由 44 人组成，主席团常委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乌兰夫、柯庆施、李井泉。各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分别是：华北：林铁、陶鲁笳；东北：欧阳钦、吴德；华东：柯庆施、曾希圣；中南：陶铸、王任重；西南：李井泉、富治；西北：张德生、张仲良；军队：聂荣臻、肖华；中直和国家机关：杨尚昆。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 977 人，此外还有列席代表共 387 人。列席代表中有县委书记、大城市的区委书记、省辖市（没有代表的市）的市委书记、企业党委或其他基层党委书记。

5 月 5 日下午大会正式开幕。会上，刘少奇作《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关于各民主党派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5 月 6 日开始，大会进入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的阶段。5 月 17 日下午，谭震林在大会上作《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5 月 23 日下午，大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增选了 25 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们是：王任重、张仲良、陶鲁笳、彭涛、刘建勋、赵毅敏、孔原、唐亮、刘子厚、张苏、杨一辰、汪锋、周小舟、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平化、张劲夫、韩先楚、李颖伯、廖志高、赵伯平、孙志远、张爱萍、姚依林。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大会于这天下午闭幕。

除了开幕和闭幕，大会还于 5 月 8 日、9 日、10 日、12 日、13 日、14 日、15 日、16 日、17 日、19 日、20 日、21 日、22 日先后举行了

— 54 —

13 次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李雪峰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许多部门的负责人，有解放军总部和部队的负责人，有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的负责人，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有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市）、县各级党委机关的负责人，有工矿企业的党委书记、工厂厂长和技师，有乡、镇、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农业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的主任，有学校、科研院所的党委书记和校长、院（所）长。在大会发言的共计 117 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等 145 人，还在大会上作了书面发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 5 月 8 日、17 日、20 日、23 日的大会上，先后四次讲话。

八大二次会议的与会者着重讨论了刘少奇所作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邓小平所作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和 1956 年至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讨论了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在发言和讨论中，与会者就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义以及如何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广泛发表了意见。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中，还揭发和批判了本地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报告了本地在整风运动中同他们进行斗争的经过。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被错误地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大会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和南斯拉夫问题，一些代表在发言中阐述了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观点，并就反对修正主义思想发表看法。

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后，5 月 25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将杨献珍、王恩茂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依次

递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次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全会要求全党积极支持《红旗》杂志的工作，要求各级党委经常供给《红旗》杂志以稿件。全会决定，除在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分别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征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全会之后不久，6 月 1 日，《红旗》杂志社北京创刊。

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

一、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是八大二次会议最重要的一个文件。^① 报告内容分三个部分：1、目前形势，2、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3、今后的任务。

关于形势，报告首先援引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世界形势的发展在最近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报告认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生产发展速度等方面，早就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1957 年 11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64 个共产主义政党的会议，以及两个会议的宣言，大大加强了国际工人队伍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促进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东风已压倒西风，而且将继续压倒西风。报告认为，帝国主义阵营的首脑国，现在已经陷入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猛烈下降，失业大量增加。这个危机正在冲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且使得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学者、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战后所散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逃脱危机的欺骗宣传，彻底破产。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加深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首先是美、英、法三国之间的矛盾扩大化了；亚

① 刘少奇所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载《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11 期。

— 55 —

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继续高涨。报告还认为：帝国主义除了战争威胁、加紧镇压和剥削外，还竭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寻找新工具，企图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我们必须坚决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目前在国际范围内的重要任务之一。

谈到国内形势，报告首先肯定：整风这条总纲带动了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发展为全民的整风运动，而全民的整风高潮，又进一步地推动了全民的生产和建设的高潮。报告在指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深刻改变了我国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之后，认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中的最先进的队伍，是我们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报告在这里接受了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关于国内阶级关系的观点。

报告还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论断。报告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报告也指出：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地都应与采取整风的方法加以解决，报告认

为，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人们的思想、作风及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并汇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伟大的革命干劲。

报告特别指出：一九五八年的春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全面跃进的春天，无论工业、农业和其他事业，都有比以前更大的发展。报告在综述了国内各行各业的“跃进”形势之后说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人们精神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们精神的解放，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跃进；这种生产力的跃进，又继续刺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进和人们思想的前进。马克思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如果说我们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这样的伟大时期，那末，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不又是在经历着这样伟大的伟大时期吗？

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是报告的核心内容。报告首先论述了这个总路线的形成过程。报告重申毛泽东关于两种建设方法的观点，认为两种方法（即好些和快些的方法与慢些和差些的方法）的斗争，在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作已经在理论上解决了，而且经过一九五五年秋季、冬季和一九五六年春季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在实际上解决了。但是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保存一些所谓“右比左好”、“慢比快好”、小脚走路比大步前进好的陈腐观念。这个问题上的两种方法的斗争，直到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前，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报告特别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报告说：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的整个经济文化事业有一个巨大的跃进，在跃进中也曾出现了一些个别的缺点。这些缺点，比之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来是很小的。但是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一九五六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

- 57 -

- 58 -

报告说：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

报告肯定了成都会议关于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概括，报告说：根据几年来人民斗争的实际经验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发展，党中央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根据总路线精神，提出了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各自任务和目标，并且确定了我国工业在十五年或更短时间内在钢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

报告强调，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报告围绕速度问题批评说：有些人不认识提高建设速度的重要性，不赞成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提出了这样那样的反对意见。报告逐条批驳了在建设速度上的“反对意见”和“怀疑”、“忧虑”，提出要欢迎一种革命的常规，不要害怕出现不平衡。报告说，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应用和发展。把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充分地结合起来，把中央的力量和地方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充分地结合起来，把大型的事业和中小型的事业、提高的工作和普及的工作充分地结合起来，这一切，不但适用于工业，而且适用于其他经济事业和文化事

业，适用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整个事业。

关于今后的任务，报告有个总的说法：党在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系统地改进国家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百折不挠地为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而斗争。具体说来，报告首先谈到整风运动，要求完成整改的企业、机关、团体、学校和部队进入整风的第四阶段。报告指出：一次整风运动是不可能解决所有矛盾的。报告还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必须严格区别。只要是人民群众内部的思想问题，都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处理，而不应当采取强制压服的方法。在学术文化领域内，必须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报告还说到改进国家工作方面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正确地解决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问题。报告认为，这是目前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使全国各方面的建设工作能够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也使中央各部门能够集中精力去办那些应当由自己负责办好的事情。报告还提出，随着管理体制的改进，必须改进现行的关于经济工作以及其他工作的各种规章制度；继续精简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机构，改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

报告还提出，在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条件下，无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都应当适当地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便更多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面临方兴未艾的“大跃进”运动，报告要求领导真正能够站在群众的前面、运动的前面，而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运动的后面。报告说：现在群众的热情很高，这是一切事业能够迅速向前发展的基本依靠，我们应当十分爱护，绝不允许向群众泼冷水。报告还谈到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干部应该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和加强思想工作、政治工作的问题。报告最后说：我们的六亿多人口在革命觉悟高涨和革命斗争胜利的速度方面，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西方最发达的资

- 59 -

- 60 -

本主义国家，而在经济文化发展的速度方面，也必然远远地超过他们。

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二、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和决议

莫斯科会议包括两个会议，一个是 1957 年 11 月 14 日至 16 日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个是同年 11 月 16 日至 19 日召开的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前一个会议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 12 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了宣言。后一个会议也发表了和平宣言。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这两个会议，并在两个会议的宣言上签字。

邓小平向八大二次会议报告了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及中国共产党团在会议期间的工作。邓小平的报告共分 6 个部分：1、关于国际形势；2、关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3、关于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4、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各民族特点的相互关系；5、关于修正主义；6、关于思想工作。

八大二次会议作出了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①，大会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两个会议期间所进行的工作表示满意。决议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和所通过的两个宣言，开辟了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给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一切和平民主进步的力量以极大的鼓舞。这两个宣言得到了全世界共产主义政党的欢迎和拥护。

决议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的观点，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任务。

决议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总结了一百年来特别是近四十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阐明

了各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遵守的共同原则，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根本方针，奠定了各国共产党团结的思想政治基础，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的文件。

决议重申了莫斯科会议宣言的一些重要观点，指出：宣言发表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兄弟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方面，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在团结合作方面，都有了新的成就。

决议认为：宣言关于当前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的断定，也被事实证明。决议最后认为：必须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同各国兄弟党一起，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是我们党对国际工人阶级的神圣义务。

根据大会主席团的意见，大会同意只对外公布会议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三、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及说明
授中共中央的委托，谭震林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②。谭震林首先介绍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情况。他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一九五五年冬季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期间提出来的。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和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对于农业生产高潮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对于广大农民的革命干劲，发生了巨大的鼓舞力量。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春季，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建

① 八大二次会议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载《新年半月刊》1958年第11期。

— 61 —

设方针，对建设事业采取促进态度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受到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一九五七年九月党的三中全会上，重申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接着，党中央又重新公布了经过修正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党中央的这些正确的指示，同反右派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所造成的群众积极性相结合，才又在更大规模上产生了去冬以来农业生产的新的高潮。

谭震林说：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底，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他预计一九五八年粮、棉、油等农产品一定会有较大比例的增长，例如，全国粮食增长的比例，将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谭震林总结说：上述情况说明，从一九五五年冬季以来，这三个冬春、三个年头的农业生产建设显示了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形的过程。这种反复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它生动地教育了干部，教育了人民，使人民有所比较，从而更清楚地了解到：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必须艰苦奋斗，努力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是这条总路线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具体纲领。

接着，谭震林谈了提前实现和超额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划的具体措施问题。他说：自从一九五七年冬季开始农业新高潮以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专区、县、乡、社，都提出了提前实现和超额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按照各省（市、自治区）的规划，全国共有几百个县（市），计划在今年分别达到粮食亩产 400 斤、500 斤、800 斤或者破棉亩产 100 斤。还有许多单位提出提前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绿化”和“四无”等口号。现在，各地提出的增产指标一般是积极的，问题在于切实抓紧具体措施。要注意防止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要求。

谭震林指出：无论是那一种情况，我们都必须考虑到客观条件方面出现不利因素的可能，例如发生不能控制的自然灾害，或者由

于某些措施的客观条件不具备而落空。预先计算到这种可能，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使他们在不利条件下仍然能够保持旺盛的干劲。总之，必须实行毛主席的指示：既鼓干劲，又留余地。谭震林还说：在“四无”、“绿化”、“机械化”、“水利化”等等问题上，同样要注意踏实，防止虚报和浮夸。谭震林说：把上述这些问题预先恰当地讲清楚，对于保护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有好处，使他们早有精神准备，这就可以避免问题一旦发生的时候，精神毫无准备，垂头丧气，挫伤积极性；也可以防止再来一个反“冒进”的风波。

最后，谭震林讲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情况。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自 1957 年 10 月公布，提交农业合作社和全体人民讨论后，到 1958 年 4 月底止，共收到各地方、各方面、各单位和个人的意见 1891 条，综合整理为 337 条；又收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比较集中的意见，综合整理为 293 条。根据这些意见，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形成第二次修正草案。

这次草案主要的修改和补充是：第一，在生产指标方面，增加了发展油料作物的指标。纲要要求油料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一至两倍。花生亩产达到 300 斤至 500 斤，油菜达到 100 斤至 300 斤，大豆达到 200 斤至 400 斤。在棉花亩产量指标方面，把“四十斤”删去了，重新恢复了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布的草案的老样子，即仍然要求分别达到 60 斤、80 斤、100 斤皮棉的要求。在粮食亩产量指标方面，纲要的第二条，把几种“除外地区”删掉了，改为“允许省（市、自治区）对于本省（市、自治区）境内自然条件特别好或者特别差的地区另定指标。”在制定纲要时，还把可能发生的大水、大旱等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也估计在内了。这样，使纲要所定的指标既是积极的，而又是灵活的、可靠的。

第二，在增产措施方面，主要是把密植单张写成一条，而把水利和水土保持合并成一条。同时补充和修改了关于水利、肥料、土壤和机械化等条款。水利，着重讲了“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

办为主”的方针。肥料，提高了养猪指标和化学肥料的增产指标。改良土壤，比过去的条文写得更具体了一些，特别强调了低产地区的土地改造和土地深翻。机械化、电气化一条也重新改写了，反映了当前的农具改良运动，反映了发展地方小型工业和依靠合作社的资金积累来实现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的可能性，强调了农具改良运动的现实意义。关于多种高产作物方面，提高了稻农播种面积的指标，又着重强调了薯类。

第三，纲要修正草案第三十一条，“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比较重要的修改。重新提出了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增加了关于在农村兴办农业中学和提倡勤工俭学等内容，也提到了开展农村体育活动。

会议决定基本通过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再作必要的修改后，提交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讨论通过。

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破除迷信、国际国内形势、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等问题。

第一，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毛泽东说：这次大会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路线，世界上的事情怕认真，不认真就搞不好。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不认真，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面积广大。现在人民解放了，不仅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出了前途。早一些时间还看不清楚多快、多大的规模，要多少时间可以摆脱落后状态，被动的状态，在世界上没有地位的状态。我们六亿人口的大国，杜勒斯不看在眼里，我们的情况不太相称，所以这种看法也是有理由的。人虽然多了，

- 65 -

争两千斤亩，争出钢的炉数。四十条现在不要十二年了，大体上五年差不多了。可能在五年内实现四十条，这不是上游吗？不是多快吗？但还要好省。从国外来说，同外国比较，争取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超过美国，报纸上宣传还是十五年超过英国，这次大会对这个提法有些修改，把“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改成为“十五年或者更短一些时间内超过英国”。这里打了很大的保险系数，实际上七年就可以赶上了，有些项目还不要七年，比如煤炭两三年就可以赶上了。

毛泽东还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人可能看了不大懂，没有个主词，鼓什么人的劲呢？本来考虑加上一句，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积极因素作为主词。其实不加主词也可以，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干劲就是六亿人民的干劲。六亿人民的绝大部分干劲很大。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毛泽东特别批评了所谓“观潮派”。他说，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这个时期观潮派还相当多，中央、省、专、县、乡、社都有“秋后算帐派”。现在情况好些，但仍有一些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他说：对于观潮派、秋后算帐就要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不能不准人家革命。地方上还有许多观潮派，等着秋后算帐，要很好地说服他们，给他们讲讲形势。我去年在夏季形势中讲了，要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转变。他们还是积极分子。

第二，关于破除迷信。

毛泽东说：我们有些同志有好些怕，其中有的怕大学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以来慢慢就不那么怕了，或者怕的没有那么厉害了。这是讲怕资产阶级教授。是否也怕无产阶级教授？我看有的，譬如说怕马克思，他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上好几层楼梯才能爬得上去，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因为马克思也是人，他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脑子，跟我们差不多。不过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

但是没有表现出来，总有一天我们赶上英国，赶上美国，他才知道确实有这个国家。

毛泽东说：过去这几年，特别是去年一年，有些人对多、快、好、省还看不清楚，到底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有怀疑，反对的也不少，这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经过一些时候，经过反复的看，才看到了。总路线的形成是曲折的，道路是曲折的，估计以后是不是没有曲折了呢？不会，还是有曲折的。这次大会制定的路线还要拿到实践中去证明。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反映了人民的干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反映了这些因素，去年九月三日全会就开始反映了，前年十一月二日全会没有反映或反映得不够，没有占上风。前年反冒进我们没有料到。有两件事是没有料到的。一件是1955年的冬天，我们没有料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和出现了一个波匈事件，来了一个世界反苏反共的高潮，这个事件影响了世界，影响了我们国家，影响了我们党。一件是国内反冒进，事先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上半年没有预料到。

毛泽东谈到总路线概念的形成时说：现在我们形成了许多概念，如多、快、好、省，是集中多少年的经验，不仅近八年的经验，也是吸收了中外的经验。还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非常不可。人没有点干劲，或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我们说力争上游，就是向先进看齐。

毛泽东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个提法很好，是新鲜的提法，反映了人民的干劲。鼓足干劲比鼓起干劲好，干劲早就鼓起来了，有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六、七分还是八、九分？十分就足了。干劲各有不同的。早就有这个提法，鼓足是个新话。力争上游从前就有了，不是新话，现在有新意。什么叫力争上游呢？从国内来说，无非就是争千斤亩，争四、五、八、

- 66 -

一定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所以在实际方面是超过了。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理来。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我们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要努力就能上去的。

毛泽东说：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我常常和一些同志谈，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服从外国一百多年，吓怕了，什么都怕。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子，总觉得自己不行。我问过在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大家都摇头说，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了吗？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是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神仙吗？第三，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算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这说明在这点上是有迷信思想。

毛泽东说：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轻的，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学问比较少的人，被压迫的人。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接着，毛泽东一连举出20多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他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为说明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没有学问的胜过有学问的，不要被大家问家、名人、权威者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被这些东西所束缚，要从这种束手束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要把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丰富的智慧、创造能

- 67 -

- 68 -

力解放出来。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现在开始发挥创造性了，办法是揭盖子，揭压抑创造性的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爆发出来。如工业过去有不少人认为是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呀，总之迷信很大。我不晓得什么工业，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我说不要把它看得那样严重。开始不懂，学过几年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有十几年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成工业国。对于这类事情首先要藐视它，然后在具体做的时候要重视它。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上“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口号十分欣赏。他说：我看这个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说是不是狂妄呢？不是，我们不是狂人，是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革命者，我们主张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起来，我们的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相脱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

毛泽东在批判了奴隶性、“贾桂作风”之后指出：人要谦虚，谦虚有两种，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实际的谦虚。教条主义者是过分的谦虚，模仿派，什么都照抄别人的、外国的，看不起自己。中国的旧诗中，有一种拟体诗，就是过分的谦虚，自己没有独创的风格，一味去模仿别人。修正主义也是一种过分的谦虚。真正的谦虚等实际。他说：不要有自卑感，不要狂妄，不要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我们要敢想、敢说、敢做。其基础是马列主义。

会议期间，毛泽东5月18日批发了一份关于工人进行技术设计的文件，他作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示。“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

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笑月落听鸿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大会除了印发《倪伟、王■中同志给计委党组的报告》外，还印发了《沈鸿同志关于“技术科学创造和发明者小传”的说明》、《关于机械、电气技术史上主要发明家的材料》、《四百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关于李始美治白蚂蚁的情形》等几个文件给大会代表。毛泽东在5月18日的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说：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来剥削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

第三，关于超英赶美。

在几次讲话中，毛泽东都谈到超英赶美的问题。他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个多嘛！我们这么多人，现在六亿，再过十年十五年八亿，人多总要做事，总不能光睡觉嘛！吃了饭就干社会主义，无非是搞工业、农业嘛，搞文化科学嘛。因此说十几年二十年就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毛泽东说：明年1100万吨钢，后年1700万吨，世界就会震动，如果五年能达到4000万吨，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就能赶上美国。

毛泽东也谈到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苏联20年加上半年是1800万吨钢。1917年是400万工人，1913年是400万吨钢。所谓20年加半年是从

- 69 -

1921年至1941年6月战争爆发，搞了1800万吨钢，除去底子400万吨，净搞1400万吨，就拿这些钢打败了希特勒。我们不用这些年，我们有了苏联的帮助，有六亿多人口，我们从苏联学来了经验，他们40年的经验也就是我们的经验，他们走对的我们继续走，不对的我们就不走了。

毛泽东还由这个问题谈到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他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十年十五年后，那时赶上了英国、甚至赶上美国，工业化了，钢不是500万吨，而是一亿多吨，八亿人口了不起，就会翘尾巴，看不起人。那时神气来了，就看不起小国，看不起别的国家。他说：目前我们藐视资产阶级，藐视神仙，藐视上帝，藐视这一套是对的，但不要藐视小国、藐视自己的同志。对帝国主义，老子瞧不起人，人瞧不起老子，将来赶上英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时情况主变的。将来翘尾巴我看不怕，我们现在就讲清楚。

第四，关于辨风向和“插红旗拔白旗”。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几次讲到辨风向和插红旗的问题。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旗子，不是红旗就是白旗，或是灰色的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学校、工厂、机关究竟插什么旗？双方都在争夺，我们要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现在有少数落后合作社、工厂、机关、学校，他们那里不是红旗，而是白旗或是灰旗。我们应当到落后的地做一做工作，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横竖是要插旗子的。合作社、生产队都插旗子，不要做闭门道士。

毛泽东说：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辨别风向，看是什么风向，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有的同志说：世界上的人都分为左、中、右三种，有些人处于落后状态，有些人处于中间状态，有些人处于先进状态。现在的任务是先进的要争取中间的改造落后的人。右派插的是白旗，插资产阶级的旗子，还有保守状态的什么旗子。唐朝有个叫刘知几的，是一个史学家，他说写历史要

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就是才干，学就是学问，识就是对问题善于辨别方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问题，就是辨别风向，要有辨别力。识别力有它极端重要性。中国有很多有才有学的人，但他们不能识别方向。斯大林说过：领导者要有预见，预见就是识别风向。

就是在还没有刮风的时候，就能看到风要来了。站在看台上什么都

看不见，这种人是没有用处的。特别是当事物已经存在还看不到，

就会给社会上右派一个机会，他们就来了。

毛泽东说：不要怕插红旗，凡是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到处插起来，那一个学校、工厂、连队、机关，没有插旗子的地方都插起来。要不断地插。现在有许多地方并非是红旗，有些刚红了，过几天不红了，落后了，那就要换旗子。他强调说：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敢于标新立异。当然，这也两种，一种是应当的，如列宁向第二国际的标新立异，另插红旗。旗帜横竖都要插的，一个合作社、一个生产队就有一面旗帜，无产阶级不插，资产阶级一定插。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无产阶级插。不要留空白。资产阶级的旗，我们不要插。

最后一天的大会上，毛泽东又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任何山上、任何地方都要插旗子，你不插，人家就插了，你不插红旗，他就插白旗。每个生产队都要插一面旗子，看到没有旗子的地方就去插旗子，看到白的旗子把它扯下来，插上红旗子。灰旗子也不行，请他扯下来，他不肯扯就通过辩论把它扯下来，插上红旗子，黄旗也不好，黄色工会、黄色小说，等于白旗。他还说：风向，东风压倒西风的风。大风是容易知道的，十二级的台风人人容易辨别，人吹得不舒服，房子吹倒了，树木吹倒了，小风不容易辨别，领导干部更加要注意。毛泽东引用古典说：宋玉写了篇《同赋》，值得看一看。他说风有贵族之风，有平民之风。他说风是起于青萍的根尖上，“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最难辨别。

第五，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这个方面，毛泽东的讲话牵涉到好几个问题。他讲了外行领导

- 71 -

毛澤東思想研究

- 72 -

内行的问题。毛泽东说，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规律。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去年右派、中间派都提出这个问题，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说外行能领导内行，这是一般规律。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大多数共产党员、工人、农民都不是专家。因为世界上有一万门科学技术，一万种职工。一万行中每人只能精一行。一万行中，一行对其余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精两三行，四五行就厉害了。所以内行少，外行多。隔行如隔山，除了本行以外，把其他行摸一摸，熟悉一下是必要的。如搞党的工作的，摸一下工、农、商等是可以的，但不是专行。对于其他行略微熟悉一下是可能的，但要都熟悉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举孙中山为例，说孙中山原来是当医生的，医生是他的正业，政治是付业，后来转化成政治是正业，医学是付业，他就可以管医生了。毛泽东说：政治家是管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队伍的，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对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教授看我们不起，我们也觉得不行，没有道理驳他们。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内行领导内行是很难的。

毛泽东谈到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时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不够全面，缺乏辩证法。干部决定一切，那群众呢？技术决定一切，那政治呢？毛泽东说：列宁是对的，他说：“苏维埃加电气化”，这就是以虚带实，政治带业务，苏维埃就是政治，电气化就是技术，政治与技术结婚就产生社会主义，他俩结婚就会生儿子，就产生七年超英国、再八年超美国这两个儿子。第一个叫超英，第二个叫超美。

毛泽东还提出设置对立面的主张。他说：要设置对立面，对立面是客观的存在的，人民中的创造性也是客观存在的。如右派在社会上是存在的，他们想说话，我们就让他讲，让他们大鸣大放。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设立对立面。整了右派后，我们有些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就松懈了，不想整改了。我们又强调“双反”，大字报，上海几百万张大字报，对立面就出来了，逼得工厂、学校党委

非整改不可。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随意设置和建立的。毛泽东还说：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的，如右派本来是存在的，放不放这是去年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决定叫大放特放，放出来造反，激动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同他们对抗，把他们整下去。另一种是原来没有的，是人为设置的，如水库、水坝。这在原来是不存在的，现在到处星罗棋布。这就树立了对立面。水要流，我们抬高位置让他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行船、综合利用。再如开工厂，长春汽车厂是原来没有的，这是工人设置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党的分裂，高岗、陈独秀对我们也有帮助，王明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些对立面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是不是人为地造一个高岗、陈独秀呢？那也不必。要有一定的气候和条件，这些东西才能出来。注意领导艺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象农民除草一样。

在大会发言中，有代表说“跟着毛主席走就不会犯错误”。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昨天有同志讲：“跟上某人走就不会错”，这个某人是我毛泽东。我看这个说法不全面。我说是又跟又不跟，这要看对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今天的对就跟，明天的不对就不跟。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担大粪的，要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要跟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正确部分。合作化，我们是跟贫农、下中农；多快好省，也是首先在群众中出现的，在许多工厂、农社、商店……也都出现了。不要糊里糊涂地跟某一个人，要独立思考。毛泽东还说，先跟什么人？后跟什么人？我们要先跟人民，人民的干劲、人民的多快好省，人民的许多发明创造；人民的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等等；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所有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工农商学兵，思想方面、理论方面，有各种人才，他们是代表人民的。这次会上，许多发言很好，我就讲不了这么多东西，你们比我讲得好。这些都是正确反映了人民的东西。总结起来，你说先跟谁呢？尊重唯物论就要先跟人民。先要跟人民，以后人民才跟我们。按照理论与实

- 73 -

践和统一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先是理论来源于实践，以后理论又为实践服务，指挥实践。开头没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才反映到人民的头脑中间，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头脑里面，才有了理论性的总结，客观规律才能反映到主观世界里来，这是给我们的模范。我们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发展理论，指导实际，只能从实践中得来，不能从别的地方得来。老是不出门，闭上眼睛，离开了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体系。我们这次大会上路线的制定，不可能由某些个人想出来的。不管官多大，地位多高，怎样有名气，只要半年时间不向人民学习，不去接触人民，不去同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接触，也就不知道什么事，就贫气了。

毛泽东特别强调党的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有些人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老资格，靠官架子吃饭，特别是作了大官，靠这个吃饭，而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要靠“你是我管的”吃饭，过去当官的官气，就是看不起人，“你是我管的”，这样就妨碍了群众创造性的发展。我们要破除这个东西，谁有真理我们就服从他，不论他是挑大粪的、扫街道的。不论你做的官有多大，只要真理不在你手里，我们就没有理由服从你；真理在你手里，就服从你。烧掉了多数人的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很难作怪，就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的东西。摆架子，看不起人，这是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一种高级趣味。

第六、关于形势。

形势问题，也是毛泽东几次讲话中反复谈到的一个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国际形势基本上是好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处都有乱子。如黎巴嫩，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等……这些地方发生问题，与我们有关系，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都于我们有利。帝国主义互相吵架，互相争夺殖民地，美国压迫黎巴嫩、拉丁美洲……有时候看起来好象不好，天上有乌云，这时要有见，不要

为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不要因为暂时黑暗就觉得不好，我们不行了，倒霉了，没有这么回事。

谈到国内形势，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很好，一片光明。过去没信心，不是一切怀疑，基本上是 40 条的问题，现在信心提高了。是因为农业生产大跃进，逼迫工业也大跃进。南宁会议只提出地方工业在五年内或七年能不能超过农业总产值的问题，一提就把纲提起了，2 至 4 三个来月，地方工业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所以说国内形势是很好的，但要看到阴暗一面，不要怕。毛泽东说：国内问题，还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没有农民作为同盟军，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解放前不到 400 万工人，现在 1200 万人，增加了两倍，连家属也不过 4000 万人左右。而农民有五亿多，所以中国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毛泽东说：不抓农民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解放后的农民精神振奋，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斗还是在农民问题上，不相信多快好省，首先是不相信 40 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可以大跃进。托派从来就是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多是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就坐不稳。

在形势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要对付灾难的主张。他说：要准备对付灾难，无非是大灾，赤地千里，还要准备对付大战，帝国主义有疯子，扔原子弹。还有党内会不会闹分裂。现在看来，一般的不会有，可能性是有。毛泽东说：和平是第一种可能性，战争是第二种可能性。现在看争取和平比过去可能性大，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强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西方世界有许多不愿意打仗的人，除去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中也有不愿意打仗的。和平可能性很大，战争可能性也有。打起来，顶多三年，把帝国主义一扫而光。再就是党内分裂。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出现党内分裂，就要乱一阵子。但又会走向反面。

- 75 -

6 手稿

毛泽东说，我讲的不是中小灾，是大灾——战争、分裂。我们中国人把结婚叫喜事，是红喜事，死人也叫喜事，是白喜事，合起来就叫红白喜事。这是有道理的。生是喜事，是突变。灭亡也是喜事，讲辩证法又不赞成灭亡，不是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有灾难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突变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生死都是突变。从生到死几十年内是渐变。旧事物死亡是好的，蒋介石政权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这是合乎规律的。毛泽东还说：我是讲要防止大的、不利于人民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的大分裂，象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罗章龙，第三次是张国焘，第四次是高岗。今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分裂？我看不可能，只要有党就有可能，一百年以后这个党可能有变化。年年月月有分裂，如细胞的死亡；年年月月有团结，如细胞的新生。新的事物都有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

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

无论是大会发言^①还是小组讨论，涉及的方面和内容都十分广泛和丰富。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还是怎样贯彻执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问题，并交换关于工业生产和其他建设事业的经验。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与会者一致高度评价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发言说：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和形成，是从我国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也从正确地运用苏联的建设经验中，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复思考和研究所总结出来的。这是对八大第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发展和补充，它是“中国

^① 部分代表的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当时已刊登在1958年第9至20期《新华半月刊》上。

守思想之后，紧接着主席又提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党内曾经有过不同的思想认识，有赞成的，也有怀疑的。经过两年来实践中的斗争和反复的比较，使党内对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也获得了必要的教训。河南省委负责人在发言中说，严肃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保证正确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关键。当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占了上风的时候，社会上就出现一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局面；当正确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的时候，社会上就出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轰轰烈烈、蓬蓬勃勃的新气象。这也说明了在党内战胜右倾机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正确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会上批判“反冒进”和批判右倾保守的呼声成为基调。在小组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工作报告时，广东组认为，对于反“冒进”问题的思想根源、错误性质和后果的论述感到不够充分。大家认为发生反“冒进”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中央工作的个别同志来说是思想方法问题，在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中则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有些人是由于严重右倾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缺乏热情或严重对党不满，因而借反“冒进”之名对党进行攻击的。就全国说，反“冒进”的错误虽是思想方法的错误，但不是一般方法的错误，而是在建设路线上带根本性质的错误。江苏组在讨论中，有些代表认为，关于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评问题，批判得不够，语气嫌轻，对立面讲得不多，思想方法及思想根源没有分析，对反“冒进”带来的影响估计不足。因此，批判的份量要重一些，对立面要明确，特别对思想方法和思想根源要集中分析批判。有的代表认为，这种错误主要不是来自地方，而是来自中央机关的一些同志，中央要多负一些责任。河南组认为，反“冒进”的问题，必须加以清算。反“冒进”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挫

折和打击很大，影响很广。右派分子就抓住我们这一点，说全面“冒进”了，否定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干部很居心反“冒进”，思想总是不解放，小心谨慎超过敢想、敢说、敢干，结果什么都照章办事。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路线，必须把反“冒进”的问题弄清楚，只有批判的彻底，批判深、批判透，才能解放思想。

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和执行时，许多人在发言中强调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四川省委负责人说：和历史上许多革命斗争中的经验一样，党内对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正确路线方针的认识，并不是不经过斗争就可以获得一致的，不经过反复的比较，就连已经获得的正确认识也很难巩固。一九五五年批准右倾保

折和打击很大，影响很广。右派分子就抓住我们这一点，说全面“冒进”了，否定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干部很居心反“冒进”，思想总是不解放，小心谨慎超过敢想、敢说、敢干，结果什么都照章办事。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路线，必须把反“冒进”的问题弄清楚，只有批判的彻底，批判深、批判透，才能解放思想。

地方各代表团批判“反冒进”甚至影响到了军队。在军队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中，有的代表提出军队是否有反“冒进”的问题。有代表认为，在军队的生产建设中有人给部队生产热情“泼冷水”。还有代表说，热火朝天的部队军事训练，被一股“时间少、内容多、消化不了”的风吹掉了。

在经济建设中曾经提出和执行了正确主张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中央负责人，不得不分别在大会上发言，就1956年的“反冒进”问题作检讨。

第二，关于破除迷信。

对“反冒进”的批判，促进了对“破除迷信”的宣传。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这个问题之后，与会者更是把它作为讨论的重要内容。湖南组在讨论中认为：主席的讲话对于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极其深刻、伟大的意义。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赶，而在于敢不敢赶，主席的讲话已经使我们从思想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速度，必将打破古今中外的一切纪录，也将大大超过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速度。新疆组的代表说：大家体会主席讲话总的精神，就是教育我们要有马列主义的创造性，要破除迷信，要思想解放，要敢想、敢说、敢做。使我们提高认识，必须看到新生的力量虽然它刚刚萌芽，开始时力量很小，但它是最有生命力的，是有巨大发展前途的；必须看到问题主流的、基本的方面，不要为一时的现象所迷惑，看不清方向。广东组的代表一致认为：主席的几次讲话，对大家启发很大，这是真正的思想大

革命、大解放，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不可能的。如果六亿人民都真正把思想解放了，群众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将汇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会大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不少与会者认为，当前阻碍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贯彻执行的主要问题，是思想没有大解放，迷信没有打破。因此，很多代表联系本地方、本部门或者本人的情况，批判存在的迷信观念和自卑感。贵州组的代表说：贵州同志较普遍地存在着这样一种自卑思想：以为贵州交通闭塞，工业落后，各个方面都比不上外地，矮人一头，不敢力争上游。在工业上有些人认为离开几个工程师，戏就唱不起来，在理论工作上则认为“山沟里出不了好秀才”。有许多事情本来可以办，但有人还要看历史，望外地，好像前人和别人没有办过的事情就不可轻易去搞。云南组在讨论中认为：过去世界各国总是看不起中国人，我们自己也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洋人高明，洋货就好，而自己站不起来，自卑感很深。在国内，我们自卑感更为严重。过去领导穷人干革命，现在搞建设，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说我们没文化，我们自己也自卑，不敢打破迷信。江苏组的代表说：过去我们的自卑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迷信洋人，一是迷信高级知识分子。主席的指示把我们从两个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一方面要反对民族自卑感，不仅要敢于超过英美，而且也要敢于超过苏联，事实上我国在建设速度方面已经超过了上述国家；另一方面要反对劳动人民的自卑感。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近来出现的许多新的发明和创造，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相信中国六亿劳动人民，解放人民思想，使人民敢想、敢说、敢做，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真是一片光明。

在讨论破除迷信问题时，一些与会者联系到知识分子问题谈了看法。有的代表认为：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调他们的作用一面多，而对他们必须经过改造的一面强调得不够，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更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这种情况。

- 81 -

要注意克服经验主义。

第三，关于个人崇拜和学习毛泽东。

毛泽东提出的“个人崇拜”问题，在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中引起广泛的反响。许多人一方面否认党内有人崇拜，一方面又把毛泽东作为真理的代表，发展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湖南组的代表认为：我们党是不存在个人崇拜问题的。主席第二次讲话中谈到，有人说只要跟着主席走就不会错。他说又要跟又不跟，要有独立思考，要看真理在那个手里，只要他手里有真理我就跟。从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到毛主席谦虚的高尚的风格，一方面说明了我们衷心地跟着毛主席走，并不是崇拜个人、迷信个人，而是崇拜真理，因为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就是真理的代表。有的中央负责同志在书面发言中说：经过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的代表，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我国人民有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发生伟大的作用。还有的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在大会上发言说，毛主席的建设路线，不是别的，就是他的经过多次革命烽火的考验、被充分证明了的、无往而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对当前客观实际的掌握和运用，是对于国际的和我国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造。我们有了毛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与会者还特别强调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和各次讲话。有的中央负责同志说：事实又一次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是真理的代表，听毛主席的话就是相信真理。我国人民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着伟大的作用。我们应与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领会毛主席的思想，学习毛主席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思想经常开朗，才能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主席指示对知识分子必须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而且把他们放在应该改造、消灭的阶级之内，才又把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端正过来。北京组的代表在讨论中说：过去许多老干部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因为和他们接近时没有共同语言和感情，就敬鬼神而远之。这些人可以“通天”，在学校稍有声色不妥就到处告状，有些干部对这点很恼火。这些人用“洋人”、“外国人”、“学问”吓唬人，实际上没什么学问。这个组有的代表还觉得科学院对资产阶级教授估计过高、迁就太多，对党外资产阶级专家信任过多，提出科学院工作应该注意阶级路线、群众路线。军队代表团西北小组代表认为：过去把知识分子列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生活上给予很多特殊照顾，知识分子的尾巴便翘起来了。这对他们的思想改造非常不利。当然，会上也有同志提出疑问：中央的工作报告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提并论，是否有问题。还有同志提出，是否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改为“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是，这种意见声音微弱，终究淹没在对知识分子的指责声中。

与破除迷信问题相联系，与会者还讨论了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问题。究竟以反教条主义为主还是以反经验主义为主，意见并不一致，有些代表认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都应反对。更多的是注意克服经验主义的提法是对的，有好处，符合党内实际情况。反冒进就是一个例证。教条主义确有，也使工作受到损失，但比较容易看得见，也较易于克服。有些代表则认为：目前束缚干部思想最大的还是教条主义的规章制度，而报告中提出应更多地注意克服经验主义，是否恰当。还有些代表认为目前应该主要反对什么，可以分开写。如对老干部应突出强调克服经验主义，对新干部应多强调反教条主义；对高级干部应更多强调克服经验主义，而对基层干部则应强调反对教条主义。从发言和讨论的情况看，多数人主张以反对经验主义为主，认为：就当前总的情况来看，还是经验主义多，从反“冒进”以及今后大刀阔斧地搞建设来看，都

- 82 -

要克服主观主义，少犯错误，避免摇摆。有的中央负责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必须学习的，苏联和其它兄弟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是应该学习的，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必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学习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独创精神，学习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的指示，学习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地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湖南组的代表说到，过去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十二本书，都是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没有把毛主席的著作编进去。因此必须重新规定干部必读书，并把毛主席著作确定为干部必读的主要内容。建议中央作出规定，今后干部学习，必须以毛主席的著作为骨干，结合学习各个革命时期的中央文献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重要报告。湖南组的代表还建议，党校的学习内容也应该改变，中央宣传部立即编印一本包括上述文件的书。

与会者还在讨论中谈到毛泽东的地位及毛泽东著作的地位。云南组的代表认为：中国有六亿人民，又继承了马列主义的传统，我们出现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像当时德国出马克思，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俄国出列宁一样，是完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还有位代表在书面发言中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经验，加以分析，总结起来，化为理论，写成了书，变成革命行动的指南，指导现代人，教育后代人，象圣人一样。但是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圣人。内蒙古组有的代表认为：过去提的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后来改为学习毛泽东著作，都概括不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贡献，是否可以提为“毛泽东主义”。一位省委第一书记在大会上发言中说：这几年来，我们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偏向，过分强调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而忽视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这是不对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的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卫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

- 83 -

- 84 -

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好的教科书。这位省委第一书记还批评说：党内有不少同志对毛主席的著作重视不够，不去努力钻研，却转而向外国的书本中寻找经验，这当然还是崇拜“洋人”思想的表现。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不要怕马克思，人人都可以做马克思。他建议在全党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并成为一个固定的学习制度。他还向大会报告说，本省省委已经作出在全省干部中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

第四，关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在高速度的指导思想下，与会者纷纷再度设想加快本地区、本部门各项建设的步伐。李富春在书面发言中介绍了经中央经济小组讨论后的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李富春说：按照我们初步设想的指标来估算，一九六二年工业总产值大约为2300—2900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2—3倍，平均每年增长26%—32%；一九六二年农副业总产值大约为1200—1370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80%—110%，平均每年增长13%—16%。李富春还介绍各项主要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到1962年达到的必成指标和期成指标：发电量分别为900亿度和1100亿度，原煤分别为3.8亿吨和4.2亿吨，原油分别为800—1000万吨和1500万吨，钢分别为2500万吨和3000万吨，化肥分别为1000万吨和1200万吨，棉纱分别为1000万件和1200万件，粮食分别为6000亿斤和7000亿斤，棉花分别为6500万担和7500万担，牲畜分别为4—4.5亿头和5亿头。李富春在发言中还说：只要我们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上述初步设想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本帐，我国就完全有可能在一九六二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在赶上英国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努力，就可能在一九七二年或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

冶金工业部负责人在大会发言中说：最近以来，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再次地和各省市研究了钢

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后，我们的结论是：明年钢产量达到1200万吨以上，1962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1967年7000万吨以上，1972年1.2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就是说，钢产量明年达到“八大”指标，五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化学工业部负责人在发言中说：我国的钢铁和煤炭，能够在十五年内赶上以至超过美国，这是可以肯定的，但至今仍然处于严重落后状态的化学工业，敢不敢和美国较量？能不能够在十五年内也赶上以至超过美国呢？我们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在化学肥料工业方面，美国一九五七年生产化学肥料约2800万吨，今后每年以5%的发展速度推算（事实上难于达到），到一九六二年可能达到3580万吨。我国到一九六二年计划生产3000万吨，预计实际执行的结果还会大大超过，可能达到4000万吨左右。这就是说，化学肥料在五年内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是大有希望的。

一些地方党委负责人则就地方工业农业的快速发展作了发言，李井泉在发言中说：四川省对今后地方工业的发展已经作了初步规划，我们决心争取提前三年或五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争取在五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在一九六二年达到145亿元（或者还更多一点）。比一九五七年的36.1亿元增长三倍（或者更多一点），我们认为这个指标是比较有把握实现的。江苏省委负责人表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江苏面貌，苦战五年或者多一点时间全面改变江苏面貌。在农业方面，一九五八年要在一九五七年的基础上，粮食增加20%—25%，棉花增加20%—25%，油料增加50%—60%，牲畜增加80%—100%，蚕茧增加20%—25%。到一九六二年或者多一点时间，完全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在工业方面，一九五八年我们地方工业的产值将比一九五七年增加40%以上，到一九六二年或者多一点时间，全省地方工业将在一九五七年的基础上增加3—4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0%左右。

一些与会者在发言和讨论中还谈到了加速发展文化教育科学

— 86 —

卫生事业的问题。中宣部负责人向大会介绍说：据各省市的汇报，扫盲工作在5个省市可以一年完成（现在黑龙江省已经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全国范围三年可以基本完成，边疆地区（西藏除外）最迟的七年可以完成。普及小学，12个省市一年完成（现在，江苏、福建、河南、黑龙江、江西5个省已经完成），全国三年基本完成，边疆地区最迟的七年完成。在分组讨论中，有的代表提议在可能的地方，县可以办农业大学。有的代表还提出展开大规模搜集民歌的运动，并预料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亡，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

在强调加快生产和文化发展速度的同时，一些与会者也开始滋长急于改变生产关系的情绪。有代表在小组讨论中建议到1962年搞一些全民所有制的农业社，还有代表提出，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增加“举办农民食堂”的内容。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思想也有所发展。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传达了中央领导人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他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大会发言中，将上面的设想作了更为具体的描述。他认为在十五年内我国将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我国也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繁荣，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他这样讲：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

到那时，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而且，不但有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我们的人民，人人“知书识理”（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象毛泽东同志曾经预言

过的，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百家争鸣”的局面更加热闹，学术进步空前迅速。那时，我们将不止有几十万、几百万个科学文化各方面的专家，而且将从现代化工农业生产实践中锻炼出几千万个专门人才。他们既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又有最新的生产技术，他们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那时的孩子们读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象现在的一些学者们“言必称希腊”时所讲的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千年来人们曾经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只能到博物馆里才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那时，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卫生已经大大改观，现在的破旧的茅草棚，除了特别保存下来，当作教育后代的展览品以外，也都被阳光充足、空气新鲜的新式楼房所代替。今年和以后栽种的树木都已成荫成林，城市变成了大花园，农村变成了工厂林立、街道整洁，卫生体育设备齐全的小城市，“村村流水，户户垂杨”。讲卫生已经普遍成为人们的习惯，人人服装整洁，吃饭用公筷，饭前便后洗手，用肥皂和洗衣服、洗澡的用水总量将创造空前未有的世界纪录。全国的体育运动员，贺龙元帅的体育大军，将以万万人计，在世界运动会上项项名列前茅。不难想象，那时人们的疾病将大大减少，健康水平将大大提高，而逐渐成为德智体育能够全面发展的新人类。

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化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人们不但可以经常看到电影，而且可以从电视机里学科学、学先进经验，

— 87 —

— 88 —

同先进人物会见，看到整个地球以至整个宇宙许许多多的新东西。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到那时候，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经基本驱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领导和群众，群众和群众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早已成了社会的新风尚，大家都具有为着社会公众利益进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保证进一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新道德，将成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规范。随着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人们的劳动兴趣和技能将大大提高；随着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的发展，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将大大加强，全国真正变成一个亲密、和睦的大家庭，那时，虽然个人同集体的矛盾仍将存在，但是个人主义已经变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臭东西，先进同落后的矛盾也仍将存在，但是，将在跟现在不同的、在更高级的形态上进行着斗争，继续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综合上面说的这四个方面，那时，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而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的内容还涉及国际形势，莫斯科会议和南斯拉夫问题，一些地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全国农业纲要四十条以及补选候补中央委员等方面。

大会之后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确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虽然反映了人民群众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迫切愿望，但从根本上忽视甚至背离了客观规律。因此，八大二次会议没有在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前进，反而从八

大后退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严重影响。

会议之后，“大跃进”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从党中央当时转发的《江苏省委关于传达和学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就可窥见一斑。这个报告说，八大二次会议之后，省委召开了三届八次全会（扩大），各地、市、县委书记，高校党委书记和省委各部委、各厅局党组书记参加了会议。报告说：与会者听了传达并进行讨论后，个个精神焕发，心情舒畅，雄心更大，干劲更足，坚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能够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向共产主义迈进”。报告说，省委全会“首先，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生产可以一翻再翻。”报告说：当前对跃进的认识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是小跃进还是大跃进，就是增产百分之几、百分之几十，还是一翻再翻的问题，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还是没有解决的。怀疑派在这上面做文章。”“会议认为，有些人把农业增产问题，说得那么神乎其神，玄而又玄，是一种很大的迷信……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使产量成倍地翻，必须措施成几倍地翻，干劲成几倍地翻。”“其次，是继续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肯定了地方工业可以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情况下大发展……南京市的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要在五年之内，钢的产量达到300万吨，超过人口仅次于我国的东方大象——印度，赶上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比较发达的瑞典的水平。”“第三，是大破了对于‘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科学技术并没有什么神秘，自然科学就是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把我们现在在生产上所干的一套总结起来，有许多就是最新的科学技术，有些还是世界科学技术的尖端（如我国小麦亩产4000多斤）。”报告还错误地估计知识分子队伍状况，说：“从这次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这些道貌岸然的‘学者’，有的是对党有刻骨仇恨愿意带着花岗石的脑子去见上帝的顽固分子，有的是一贯崇美亲美的投机政客和实行奴化教育的‘专家’，有的是不择手段弄虚作假骗取名利的大骗子毛，有的虽有一些真才实学，但却是以奇货自居，向党内人民讨价还价的贪心分子，具有真

— 89 —

— 90 —

才实学而又诚心诚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还是少数……我们决心通过交心运动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贯彻到底，拔掉所有的灰旗、白旗，把工人阶级的革命红旗插遍各个角落（例如大学的各个教研室，厂矿的各个科室，各个科学研究所和技术推广站等）。”这个报告还说：会上有人说：“破除迷信没有底，解放思想没有边”。主席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指示，“正象第一个中子打进了原子反应堆，迅速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连锁反应，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报告提出，该省在三、五年内，可能争取平均每人粮食达到1500—2000斤的水平；工业产值可能在三年之内赶上和超过农业产值，到1962年，在1957年的基础上增长6倍，争取达到7倍。那时工业和农副业的产值比例可以达到工六农四，争取工七农三。1958年7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认为“江苏省委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

总之，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宣传高速度思想成为舆论的主调，而实际的“大跃进”运动更是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全国各条战线全面展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儿。

No.5

1958年北戴河会议

韩 钢

1958年北戴河会议，是指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大跃进”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大跃进”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作用。

会议前的形势

北戴河会议前，经过一系列中央会议，“大跃进”运动已经全面地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正如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所说：“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实现各项工作的全面“跃进”。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为适应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形势，除了应当发挥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积极性以外，还必须充分发挥协作区的积极作用。决定提出要在中央集中领导下，按照全面规划，逐步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因此，决定提出不但对于财政经济工作要实行分级管理的制度，而且对于建设计划，特别是经济计划工作，还充分采取全面规划、分级平衡、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方针。决定认为这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

— 91 —

— 92 —